



鲁迅研究书系

反省与选择

——鲁迅

文化观的多维透视

黄健 著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鲁迅研究书系

反省与选择

——鲁迅

文化观的多维透视

黄 健 著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4 号

· 鲁迅研究书系 ·

反省与选择

——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

黄 健 著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8.125 印张 5 插页 207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00

ISBN 7—5419—5096—3/G · 4386

(精装) 定 价: 30.20 元

· 鲁迅研究书系 ·

序 言

袁良骏

自 1913 年恽铁樵(焦木)对《怀旧》的评点以来,鲁迅研究整整走过了 80 年的路程。80 年来,学者辈出,论著汗牛充栋,鲁迅研究已成为与“红学”比肩的“显学”之一,成就斐然。

然而,不必讳言,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鲁迅研究,曾受到过极“左”思潮的严重干扰,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实用主义一度过滥,终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“四人帮”引入歧途。

新时期以来,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广大鲁迅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,拨乱反正,认真清算了“四人帮”对鲁迅的神化、篡改和歪曲,鲁迅研究理所当然地和其他学术部门一样,恰如枯木逢春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、开拓、创新与突破。与此同时,宝岛台湾也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禁

令，诸多学人建言立说，踊跃努力，正在为“鲁迅学”开拓新生面。90年代和世纪之交，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的鲁迅研究，必将呈现更加生动活泼的面貌。

《鲁迅研究书系》承前启后，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编辑出版，它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总结，也是90年代和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开路先锋，它将在鲁迅研究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。

《鲁迅研究书系》共收入专著、专书15部。除关于鲁迅小说、杂文的二三专著外，偏重于论述鲁迅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思想，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概括性。

特别令人高兴的是，15部专著中有11部出于中青年学者之手。它充分展示出：中青年学者已成为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。我们深信90年代和世纪之交将是中青年学者纵横驰骋的年代，这正是鲁迅研究的希望所在。

鲁迅是中华民族不朽的伟人，也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巨匠之一。像莎士比亚一样，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，就此而言，这套《鲁迅研究书系》不过是滔滔无尽话题中的涓滴而已。但愿它能成为人们珍爱的晶莹的涓滴！

1992年9月26日初稿

1995年5月16日改定

目 录

导言 传统与现代：鲁迅的双重选择	(1)
§ 1. 鲁迅整体上反叛传统的意向	(2)
§ 2. 鲁迅的文化“寻根”意识	(7)
§ 3. 鲁迅对近代西方文化的选择意识	(12)
§ 4. 鲁迅双重选择的意义	(19)
第一章 鲁迅在 20 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的激流中	(23)
§ 1. 鲁迅与近代中国的两次文化冲突运动	(23)
§ 2. 鲁迅的文化批判意识	(27)
§ 3. 鲁迅的主体文化新观念	(31)
第二章 鲁迅文化观的基本特质	(36)
§ 1. 鲁迅的文化心态	(36)
§ 2. 鲁迅的危机意识	(39)
§ 3. 鲁迅的忧患精神	(42)
第三章 近代西方文化思潮与鲁迅的文化观	(47)
§ 1. 鲁迅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想基础与心理基点	(47)
§ 2. 鲁迅与进化论思潮的联系与反应	(54)
§ 3. 鲁迅与尼采思想的联系与反应	(62)
§ 4. 鲁迅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之后的文化观内涵	(73)
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思潮与鲁迅的文化观	(81)
§ 1. 鲁迅与章太炎思想的联系及超越	(81)
§ 2. 鲁迅与严复思想的联系及超越	(94)
第五章 儒家文化与鲁迅的文化观	(110)
§ 1. 鲁迅整体认识儒家文化的双重尺度	(111)
§ 2. 鲁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	(117)
§ 3. 鲁迅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承继与承担	(125)

第六章 道教（家）文化与鲁迅的文化观	(133)
§ 1. 鲁迅对道教（家）文化的独特认识	(133)
§ 2. 鲁迅对道教（家）文化的批判	(140)
§ 3. 鲁迅与道教（家）文化的历史联系	(158)
第七章 佛教文化与鲁迅的文化观	(164)
§ 1. 鲁迅选择佛教文化的内在动机	(164)
§ 2. 佛教文化对鲁迅的影响	(170)
§ 3. 鲁迅对佛教文化的批判	(186)
第八章 区域文化对鲁迅文化观的孕育与启示	(191)
§ 1. 鲁迅与越文化的精神联系	(191)
§ 2. 民俗文化与鲁迅文化观的联系	(199)
§ 3. 鲁迅眼中的民俗文化	(211)
结语 鲁迅文化观的现代启示	(215)
§ 1. 鲁迅文化观的现代意义和特色	(215)
§ 2. 文化体验深度的启示：鲁迅的方向和意义	(226)
附录 论鲁迅小说创作的文化内涵	(235)
后记	(252)

导言 传统与现代：鲁迅的双重选择

随着近代中国步履艰难地跨过 20 世纪的门槛，中西文化冲突也愈演愈烈。如何使近代中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、落后、被动挨打的局面，最终迈进现代化的大门，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课题，并迫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多方位地对它进行探寻。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强行打开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之后，以魏源、康有为、严复等人为第一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^①，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漫漫的历程。但是，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，第一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明显地表现出他们自身，以及所处的时代、社会和历史的多重局限。他们一方面从自身的体会中直感到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弊端，认识到有必要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，另一方面，在如何有效地克服弊端，怎样进行变革的一系列问题上，却又缺乏成熟的、既符合中国的现实状况、又不落后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具体方案，尤其是在思想文化观念上，由于未能真正地获得现代性质的根本转变，从而也就未能在整体的反叛传统当中，建构起富有独创性的思想文化体系。如果说第一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在 20 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过程中，已经开始停步不前，甚至呈现出某种倒退的迹象，那么，作为第二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的代表人物——鲁迅，则在接受第一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思想影响的基础上，凭借着对传统文化的透彻认识和对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敏锐感受，力求在整体地反叛传统当中，

^① 毛泽东曾把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杰出的人物，像魏源、林则徐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洪秀全、严复等人称为“先进的中国人”，本书借用这一提法来加以论述。

孜孜不倦地致力于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建构工作。因此，相对第一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的思想来说，鲁迅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已真正地完成了现代性质的根本转变（尽管作为历史的“中间物”，鲁迅介于传统与现代，东方与西方之间，与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都保持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）。同时，这种富有全新的现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观念，又促使鲁迅必须在 20 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的广阔背景上，来致力于中国新文化的建构。因而在这个意义上，如果将近代西方文化视为一种现代文明的话，那么可以说，传统与现代，也就构成了鲁迅的双重选择。

§ 1. 鲁迅整体上反叛传统的意向

当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，从严复翻译的赫胥黎《天演论》那里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时，可以说，客观现实的逼迫和自身对外部世界渴求欲望的驱使，就已经把他推到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前沿阵地。对于鲁迅来说，20 世纪初愈演愈烈的中西文化冲突，使他至少是从自身的体验中感受到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，或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，而是首先要如何端正对待传统的认识和态度。事实上，在鲁迅带着一种深刻的渴求观念变更的文化目的置身于 20 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冲突时，他也就必然而且首先遇到的是这一严峻的问题。20 世纪初是新旧文化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。思想文化上的反传统和建构 20 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，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。近代史表明：社会的变革，首先有赖于人的素质、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根本变革。人们都知道，维新派、洋务派人士不是没有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，而问题在于他们只乞求某一方面的变革，未能从急剧变化的社会需要人的素质、思想文化观念产生变化这一高度，来认识变革的意义，尤其是未能从深刻的认识传统文化观念的落后、守旧等特征上来进行把握，因而其变革运动的失败，是无法避免的。进入 20 世纪之后，在选择文化变革为突破口时，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反叛传统与迈向

现代化，也就势在必然了。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，鲁迅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接受了第一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思想的影响，但又逐步地走上了一条超越其思想发展的道路。在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中，鲁迅非常清楚地看到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现成的可以用来为整体文化变革服务的工具。因为它在其内在机制上、观念上、价值体系上都是服从于封建社会需要的。而当整个社会迈入 20 世纪时，这种服从于封建社会需要的传统文化思想，已显得不合时宜，与 20 世纪所出现的促进整体文化变革的思想，每每发生冲撞而不得不沦为文化变革的对象。于是，在鲁迅的思想认识上，一个必然的而又异于第一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思想认识的观念就产生了，这就是要建构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，必须首先整体上的反叛传统。

获得整体上的反叛传统的意识，是鲁迅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结果。鲁迅以在南京求学期间接受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为起点，东渡日本后，又广泛地接触了 18 世纪以来近代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、学说和理论。其中鲁迅尤为注重 18 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所倡导的“科学”理性精神和 19 世纪后期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强调以“个人”为本、反抗社会的学说。鲁迅认为，社会的变革，历史的发展，人类的进步有赖于科学的理性精神，有赖于“科学之进步”^①。但是，科学的精神不等于一般的西方先进技术。在鲁迅看来，近代西方文化中的“科学”理性精神和以“个人”为本、反抗社会的学说与传统文化观念存在着尖锐的对立。这种对立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与把握社会的文化价值尺度。而从整个 20 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主流上来看，“科学”、“个人”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特点，体现着整体文化发展的方向。为此，鲁迅不满于先前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维新运动，而提出“第二维新”^②之

① 鲁迅：《坟·科学史教篇》。

② 鲁迅：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。

说。鲁迅清楚地看到先前的维新派人士虽然也要求“渐知西人之长”，“知旧法之不足恃”，“纷纷言新法”^①，但是却没有真正地把握住近代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，“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，乃又舍治饼饵守圉圉之术而外，无他有之”，这样长久下去，“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”^②。基于对近代西方文化的了解，鲁迅注重人的观念变革对于维新运动的意义。他以为，“科学”理性精神，能够使人“渐悟人类之尊严”^③，其“洪波浩然，精神亦以振，国民风气，因而一新”^④，并认定医治传统文化弊端的药，只有“科学”一味。^⑤因为传统文化中的家族与礼教制度、等级观念、伦理道德价值准则，在文化观念性质的差异上，与“科学”的理性精神是格格不入、背道而驰的。然而，由于中国社会变革之难，鲁迅又尤为推崇以“个人”为本，反抗社会的精神，特别是在大多数国人还处于“昏睡”之中，少数明哲之士对于社会、对于庸众的反抗，更具有反叛的精神。^⑥因为少数明哲之士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，思想文化观念已获得一新，所以对于一切旧的传统，旧的偶像，也就敢于大胆的反抗，为此，鲁迅高度赞赏拜伦“一剑之力，既其权利，国家之法度，社会之道德，视之蔑如”的“立意在反抗，指归在动作”^⑦的战斗精神，推崇尼采、基尔凯郭尔等人“以改革而始，反抗为本”的态度。因此强调“科学”精神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对立，强调以“个人”为本的反抗，鲁迅就必然会获得整体上的反叛传统的意识。

整体上的反叛传统的意识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，导致了鲁

① 参见梁启超：《戊戌政变记》。

② 鲁迅：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。

③ 鲁迅：《坟·文化偏至论》。

④ 鲁迅：《坟·科学史教篇》

⑤ 鲁迅：《热风·三十八》。

⑥ 鲁迅后来在杂文、书信、小说当中，都对中国社会变革之难，发出过深深的叹息。参见《坟·娜拉走后怎样》、《两地书·四》、《头发的故事》等。

⑦ 鲁迅：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。

迅反传统的激进态度。从鼓吹“与旧习对立，更张破坏”^①的精神，到以愤懑的情绪发出“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”^②的呼声，都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反传统的激进态度。孤立地来看待鲁迅的这种激进态度，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鲁迅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之处。其实不然。鲁迅激进的态度，与他的整体上反叛传统的意识，恰好一致。或者说，这种激进的态度源于他所获得的整体上反叛传统的意识，其真正目的还在于对建构 20 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所作出的努力。^③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是深知传统文化弊端的一种表现。在 20 世纪中西文化的冲突当中，首先进行的工作不是去评价两种文化的优劣，而是要在西方文化像潮水般涌入古老的中国社会之际，怎样借助西方文化来认真地审视、反省与选择传统文化，以谋求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，迅速地改变其旧质，并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的新形势。鲁迅认为：“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，不肯变革”，那么，就必然会“衰朽到毫无精力了”^④。在历史的新旧交替转型的时期，恪守传统，显然要被历史所无情地淘汰，而温情脉脉地对待传统，试图以较小的变动为代价来换取对整个传统的维护，也终将为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不相容。相反，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虽然以激进的方式呈现出来，但却真正地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反省精神，一种勇于进取的选择与改造传统的精神。这其中可能会夹杂着某种偏颇或失误，然而在整体的思想文化观念上，则与整个的历史现代化进程是趋向一致的。因而，情绪上的激进态度和方式，在鲁迅那里，实际上就包含着一个严密而完整的逻辑程序：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是为了摧毁一切旧的、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，

① 鲁迅：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。

② 鲁迅：《华盖集·青年必读书》。

③ 鲁迅在后期更进一步地明确了这种认识，他指出，破坏“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”。参见鲁迅《集外集拾遗·〈浮士德与城〉后记》。

④ 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（六）》。

同时，也是为了合理的继承与选择传统。

这种近于悖论式的逻辑程序，其实并不在乎情绪上的激进与否，更重要的还在于强调要通过思想文化观念的透视，来对传统文化的思想、观念和价值标准体系，作出深刻的剖析与批判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将此称之为“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”（the cultural—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），^① 并指出这是“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”。^② 实际上，鲁迅整体上的反叛传统的意识和激进的态度，既是他坚持思想革命主张的重要构成部分，同时也是对先前维新派人士思想和主张的修正与发展。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维新运动，其中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。不仅社会各阶层带着不同的目的，出于不同的动机，投入到维新潮流之中。从而使维新运动缺乏统一的思想认识为指导，而且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时期，一直纠缠于“器”与“用”，或“道”与“体”之分，其意图是要谋求在不根本触及传统文化观念的前提下，取西方的某些长处，以富国强兵，而未能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来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，并完成现代性质的转变。鲁迅早在南京求学期间，既受到维新风气的熏陶，也亲自目睹了和直感到维新运动的种种弊端。^③ 即便到晚年，鲁迅也还对维新运动的一些主张，抱有严肃批评的态度。^④ 在

① [美] 林毓生：《中国意识的危机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12月版，第43、49页。

② 鲁迅：《集外集拾遗补编·破恶声论》。

③ 参见鲁迅：《朝花夕拾·琐记》。

④ 鲁迅在《南腔北调集·谚语》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：“清末，因为想‘维新’，常派些‘人才’出洋去考察，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，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。南海圣人康有为，佼佼者也，他周游十一国，一直到得巴尔干，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‘弑君’之故来，曰：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。”由此可见，维新派人士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根柢，仍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中，其认识事物的方式是将新的事物导向对传统的认同，而不是将传统的导向对新事物的认同。

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破恶声论》等文章中，鲁迅对维新派人士那种只重实利，不问根柢，只重物质，不问精神的倾向，持有异议，特别是对一些维新派人士那种“掣维新之衣，用蔽其自私之体”的做法，更是进行了严厉的道德谴责。这种异议和道德谴责，一方面表明鲁迅在思想文化观念上、认识上有别于维新派人士，同时在另一方面，也更加促发了他对于变革思想文化观念等精神状况的高度重视，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那样：“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精神。”^① 因为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等精神状况，制约着人们对现实历史的认识与把握。只有首先获得整体的思想文化观念等精神状况的根本性转变，才有可能获得“从旧垒中来，情形看得较为分明，反戈一击，易制强敌于死命”^② 的效果。所以，鲁迅整体上的反叛传统的意识和激进的态度，其实际内涵又表现为：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剖析与批判，必须要深层次地探究其内在的根源。在这当中，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性质的转变，是探究并捣毁这种根源的前提与保证。因此，在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性质的转变过程中，出现整体的意识，激进的态度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更显得与整个时代的节奏相吻合。

§ 2. 鲁迅的文化“寻根”意识

当然，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对于鲁迅来说，又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地割断传统，与传统进行彻底的分离。但是，导致鲁迅思想文化观念上的这种类似矛盾的现象，既不像林毓生教授所认为的那样：鲁迅“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，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”^③，也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：鲁迅“在知识上相信西方的价值，而在感情上眷

① 鲁迅：《呐喊·自序》。

② 鲁迅：《坟·写在〈坟〉后面》。

③ [美]林毓生：《中国意识的危机》，第165页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12月版。

恋中国的过去”^①。我以为，而是作为历史的“中间物”^②，鲁迅在其思想文化观念发生现代性质转变的过程中，对于沟通“传统”和“现代”之间内在关联，所作出深刻反省和选择的一种表现。林毓生教授在论及鲁迅意识的复杂性时，有一句话说对了，这便是他认为，鲁迅“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，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”。^③然而，林教授接下去的说法则是值得商榷的。他指出鲁迅“对某些传统成分的积极态度，并没有导致他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的可能性”。其实，鲁迅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如前所述，其真正的目的既然是谋求建构 20 世纪中华民族的新文化，那么就不可能不去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，而要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，也就必然要与“某些传统成分”保持着积极的联系，而不是完全地割断传统。与此同时，作为历史转变过程中的“中间物”，他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，又恰恰不能摆脱传统对他的内在制约。对于鲁迅来说，需要的则是要在这种制约与联系当中，作出清醒的历史抉择，并对所制约与联系的传统体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，从而在反叛的基础上，为建构 20 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作出艰辛的努力和贡献。

历史的“中间物”性质，决定了鲁迅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对待传统的双重态度和视角。在构成传统向现代转变的“桥梁”中，首先需要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“喊出一种新声”^④发出的。正如鲁迅后来所明确指出的那样：“新的阶级及其文化，并非突然从天而降，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叛中，亦即发达于

① 这是一些学者采用美国学者约瑟夫·赖文森 (Joseph Levenson) 的“历史”和“价值”之间的二分法所得出的结论。例如夏志清教授就持这种观点，参见他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。

② 鲁迅在《坟·写在〈坟〉后面》一文指出：“一切事物，在转变中，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”。

③ [美] 林毓生：《中国意识的危机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86 年 12 月版第 155 页。

④ 鲁迅：《坟·写在〈坟〉后面》。

和旧者的对立中，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，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”。^① 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使处于历史“中间物”位置的鲁迅，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对待传统的态度与方式，然而同时也使他通过“中间物”的视角，深刻地发现整体上的反叛传统并非是全盘否定传统。如果建构 20 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需要发掘传统的内在潜力，那么，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中西文化大冲突之中，改造传统，尤其是赋予传统的某些认知符号以新意，使之成为新文化的因子，这就比单纯地反叛传统，或割断任何联系地建构新文化，要更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。因此，在中西文化冲突中，鲁迅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文化“寻根”的意识。

“寻根”是历史“中间物”与传统保持内在联系的一种表现。处于历史“中间物”的位置，鲁迅的“反叛”，既不可能是拜伦式的那种个体与社会极端对立的“反叛”，也不可能是尼采式的那种绝对超乎于个体与社会之上的“反叛”，而是要顺着历史沉实的脉胳，在体察芸芸众生的甘苦之中，^② 寻找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契合点，以反顾的方式来确定“反叛”的基调，从而能够保存住传统文化中某些合理的成分，使整个新文化“弗失固有之血脉”^③。

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文化“寻根”，驱使着鲁迅在“反叛”的过程中对于传统持有合理选择的态度。在鲁迅看来，整体上的反叛传统，使之获得文化观念的更新之后，建构新的文化，需要调整对于传统，尤其是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认识。鲁迅认为，

① 鲁迅：《集外集拾遗·〈浮士德与城〉后记》。

② 鲁迅在《集外集拾遗·英译本〈短篇小说选集〉自序》中指出，他从小便感受到“下层社会的不幸”，知道农民“是毕生受压迫，很多苦痛”。可以说，鲁迅的“反叛”，更带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感时忧国和忧民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情。

③ 鲁迅：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。

对待传统应采取“权衡较量，去其偏颇，得其神明”^①的态度，目的则是为了“别立新宗”^②。因为在用新的观念来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，便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绝对分割的鸿沟，而是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关联。鲁迅指出，任何一种文明，文化都“无不根旧迹而演来”^③，绝不可能凭空而产生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传统与现代之间，其内在的关联实际上表现出一种否定形态的承继关系。在这里，否定便是现代对传统的扬弃，而“反叛”是扬弃的基点，“寻根”则是扬弃的方式。如果仅仅是把“反叛”看作是对传统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然分离，将“寻根”又视为复古主义倾向，不去仔细地辨认其中所包含的“扬弃”成分，那显然未能真正地理解鲁迅的意图。在鲁迅那里，整体上的反叛传统中的“扬弃”，是确定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否定形态的内在关联，“寻根”中的“扬弃”则是通过文化批判意识来积极地消融传统中的合理成分，使之成为新的质料，并生成于现代的文化体系之中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鲁迅对于传统所持有的合理选择的态度，导致了他在与传统保持联系当中，又重视和欣赏传统（尽管不是全部）的倾向。

然而，这种倾向并非林毓生教授所说的是在鲁迅“意识中私人领域的基础上接受的”，^④也非是在“隐示的意识层次”，“信奉中国的某些传统价值”^⑤的结果。我认为，这种倾向正是“寻根”的实质性内容之一。如果处于历史“中间物”的位置，在与传统的联系当中不对传统引起高度的重视，那么也就不可能用现代的

① 鲁迅：《坟·文化偏至论》。

② 鲁迅：《坟·文化偏至论》。

③ 鲁迅：《坟·文化偏至论》。

④ [美]林毓生：《中国意识的危机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17、218页。

⑤ [美]林毓生：《中国意识的危机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17、220页。